

婚姻关系、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①

罗丞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 本研究基于安徽巢湖市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 通过与非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的对比, 描述了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状况, 并进一步分析了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 代表“爱情”的婚姻关系和代表“面包”的生计策略对三类妇女的主观幸福感都存在影响, 但三类妇女追求“爱情”和“面包”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对留守妇女而言, “爱情”和“面包”同等重要, 二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互独立; 对准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而言, “爱情”和“面包”也都很重要, 但同时“面包”是“爱情”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 农村留守妇女; 主观幸福感; 婚姻关系; 生计策略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 (2017) 01-0036-12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劳动力外流现象而出现的。1970年代末, 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 引发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外流; 1980年代以后劳动力外流骤增, 且规模不断扩大 (陈浩, 1996)。截止2010年, 中国流动人口已达2.1亿; 而与此现象相伴而产生的留守妇女据估计已接近5000万人 (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1; 吴惠芳等, 2009)。与此相伴的是“女主内、男主外”以及“男耕女织”的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开始发生转变, 出现了社会转型期的新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如农业女性化、“女耕男工”等 (高小贤等, 1994), 同时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计策略也发生改变。对农村留守妇女群体而言, 留守本身是一项最基本的生计策略选择 (吴惠芳, 2011)。除此之外, 丈夫外出务工, 会使得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计策略选择更加多样化, 涉及农业生产、家庭经营、外出务工、家务劳动、照料孩子和老人等具体活动 (段塔丽, 2010; 毛桂芸, 2010; Mu, 2011; Jacka, 2012)。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首先, 丈夫外出务工也改变了夫妻之间的分工方式, 使得农村留守妇女对家庭生计资本的使用权限增加, 在家庭日常事务及重大事务当中的决策权力也得到提高 (毛桂芸, 2010; 吴惠芳, 2011)。其次, 丈夫外出务工, 使农村留守妇女承担更多的家庭生计活动, 压力增大; 夫妻双方分居两地, 长期处于性压抑的状态, 造成夫妻双方情感

^① 本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农村留守妇女生计策略及家庭福利效应研究” (项目编号: 12BRK022) 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流动人口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评估及决策支持集成平台示范应用”子课题 (项目编号: 2012BAI32B07-02) 的联合资助。

[收稿日期] 2016-08-31

[作者简介] 罗丞,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管理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农村贫困与农户生计。

交流不畅,易增加农村留守妇女的不良情绪,降低其安全感(许传新,2009;吴惠芳等,2010)。

然而,上述生计策略和婚姻关系的变化是否会对于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如果婚姻关系象征着代表精神条件的“爱情”,生计策略象征着代表物质条件的“面包”,那么,对于农村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互动关系?留守妇女要实现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到底是面包重要?还是爱情更重要?本研究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一、文献综述及分析框架

(一) 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已有研究通常采用自填方式(Self-report)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目前常用的测量量表包括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GWB)、生活满意度指数(LSI)量表等。

主观幸福感量表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编制的一种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包括6个维度,分别是: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对健康的考虑,精力、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与紧张的程度(Fazio, 1977)。在应用中逐渐发展出18个项目、22个项目、33个项目等不同版本(McDowell & Newell, 1987; Jonas, Franks & Ingram, 1997; Taylor, Poston & Haddock, 2003)。得分越高,幸福感程度越高。在中国的应用证实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邢占军, 2003)。亦有研究将生活满意度维度从主观幸福感当中抽出来专门编制相应的量表对其进行测量。例如,生活满意度指数(Life Satisfactory Index)量表,众多研究证明该量表是有效而可靠的测量工具(Neugarten, Havighurst & Tobin, 1961)。在中国509名民众当中的调查也发现,生活满意度指数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熊承清等, 2009)。

对于主观幸福感的解释性理论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自上而下”路径认为个人的人格特质会影响其对于世界和事物的判断(DeNeve, 1999),该观点关注的是遗传素质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体包括神经质、外向性、亲和性及责任心等特质(Steel, Schmidt & Shultz, 2008)。“自下而上”路径建立在Wilson的观点之上,认为如果环境允许人们满足人类普遍的基本需求,他或她就会感到幸福(Wilson, 1967),该路径关注的是情境因素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包括日常体验(愉悦体验和负面体验)、宗教信仰等;人口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如年龄、性别、种族、教育、收入、职业、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Diener, 2000)。有研究指出,情境因素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遗传因素的影响小得多;且在不同的研究中,这些因素的影响和解释力都不稳定(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 Andrew & Withey, 1976)。然而,由于遗传素质难以改变,研究情境因素的影响对于改善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 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研究

研究指出,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状况要差于非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相比,留守妇女有更多的孤独、害怕和紧张等消极情绪,更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许传新, 2009)。留守妇女在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精神病等问题的得分也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朱桂琴, 2006)。在身心双重压力下,农村留守妇女大多数幸福感不强(周庆行等, 2007)。尤其是在丈夫外出前后,留守妇女的“孤单”情绪变化更为明显(叶敬忠等, 2009a)。

目前仅有少量关于中国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周庆行等(2007)的研究指出,不

到一半的农村留守妇女有幸福感,大多数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不强;其主要原因在于:在目前的农村社会,农村的贫困实质上就是妇女的贫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实行的公共政策缺乏性别意识,农村留守妇女缺乏合适的话语权,权利和权益处于易受损的状态。郭海健等(2013)对苏北农村134名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分析,发现约有超过20%的苏北农村留守妇女无主观幸福感,而孩子少、家庭经济收入低、社会交往贫乏是主要的影响因素。王嘉顺(2008)针对留守妇女婚姻幸福感的研究发现,远距离的情感交流互动、生活质量提升、具有教育子女的能力的留守妇女具有较高的婚姻幸福感。

已有研究尚未涉及不同人群生计策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但却发现,工作绩效、金钱和财富、收入水平、闲暇时间等因素能满足个人的不同层次需求,因而也影响到个人的主观幸福感(Diener, & Biswas-Diener; 2002; Heintzman & Mannell; Casas, González, Figuer & Coenders, 2004)。对于农村留守妇女而言,由于缺乏稳定的职业和职场环境,生计策略可能直接影响到她们的财富状况及闲暇时间分配,对她们的个人生活而言至关重要(陈雪娥, 2007),由此可以推断生计策略有可能会对于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已有研究尚未对于农村留守妇女群体的婚姻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给出明确回答,但在其他人群中的研究证明婚姻关系对于个人主观幸福感存在影响。例如,基于42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分析发现,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在婚者的生活满意度得分普遍显著高于离异者(Diener, Gohm, Suh & Oishi, 2000)。由此可以推断,婚姻关系对于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也应该存在影响。

尽管目前尚无研究同时分析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有研究分析了普通人群当中婚姻关系、职业生涯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发现对男性而言,职场满意度、婚姻满意度可以有效预测主观幸福感;对于那些没有就业或半就业的女性而言,婚姻关系是可以有效预测主观幸福感的前因变量;对于职业女性而言,职场满意度对于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与婚姻关系基本相当(Ito, Sagara & Ikeda, 2004)。由此可以推断,留守妇女的生计策略、婚姻满意度均有可能对她们的主观幸福感同时产生某种影响。然而对于留守妇女而言,这种影响到到底是怎样的?爱情(婚姻关系)和面包(生计策略)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已有研究尚不能给予系统性回答。

综上所述,本研究尝试分析生计策略、婚姻关系对于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采用“自下而上”路径对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进行解释。

(三) 分析框架

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的分析框架见图1。

根据已有研究中对于农村留守妇女的定义(叶敬忠等, 2009b),本研究以农村妇女的丈夫是否外出务工以及外出的时间为标准将其划分为三类,其中,非留守妇女指的是丈夫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村妇女,准留守妇女指的是丈夫外出务工但外出时间在6个月以下的农村妇女;留守妇女指的是丈夫外出务工且外出时间超过6个月及以上时间的农村妇女。三类妇女的主观幸福感有可能取决于生计策略、婚姻关系两个前因变量;而其中,生计策略与婚姻关系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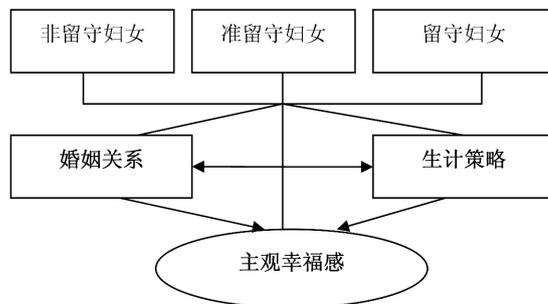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二、数据和方法

(一) 调查和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2012年12月在安徽省巢湖市开展的“农村妇女生计策略与家庭福利调查”。安徽省是劳动力外流大省,6862万户籍人口当中,每年净流出人口大约为900万人(安徽省统计局,2011);巢湖市是一个县级市,隶属于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市,总人口88万,其中净流出人口约为10万人,是典型的劳动力外流地区(巢湖市统计局,2011)。

在巢湖市11镇1乡中抽取经济发展水平高、中、低乡镇各1个,共计3个乡镇;在此基础上依照方便抽样原则从每个(乡)镇中抽取5个行政村;在当地人口计生部门的配合下,从每个行政村中随机抽取60名20-60岁农村户籍妇女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时,由当地人口计生部门协调,将各村调查对象集中到村人口学校,问卷当场发放,由调查员负责对问卷进行必要解释和说明后,调查对象当场作答后当场收回;针对文化层次较低的妇女,由调查人员在征得调查对象同意的前提下,将问卷逐题进行讲解,根据调查对象的回答填写问卷。调查结束后,共获取有效问卷904份,其中,非留守妇女219人,准留守妇女370人,留守妇女301人;缺失值14人。

(二) 变量测量 (见表1)

主观幸福感。本研究主要采用了由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编制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GWB*)对于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原量表由25个问题组成,包括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及松弛与紧张焦虑等6个因子,得分越高幸福感就越高。由于原量表中包括了一些不易理解的陈述,且考虑到农村留守妇女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的背景,本研究对于25个题项的总体幸福量表进行了简单的修订,形成了22个题项、适合于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分析发现,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Alpha系数为0.84,在非留守、准留守和留守妇女样本当中的内部一致性Alpha系数分别为0.84,0.85和0.82,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婚姻关系。一般常采用婚姻满意度对婚姻关系进行测量(Ito, Sagara & Ikeda, 2004)。本研究中通过问“最近一年您对于您的夫妻关系满意吗”,以“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说不清,4=满意,5=非常满意”对婚姻满意度加以测量。此外,考虑到留守妇女与丈夫长期分居,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本研究还设计了与性生活相关的三个变量作为测量婚姻关系的补充,包括最近一次性生活时间、性高潮频度、性生活满意度。

生计策略。生计策略指的是“满足生存而开展的相关活动”,一般包含生产经营活动、家务劳动等。其中,生产经营活动又包含农业生产经营和家庭经营、外出务工等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家务劳动是一项再生产活动,是劳动力更替的基础选择,主要包含日常家务、生殖、照料老人、养育子女等(DFID,2000)。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计策略组合通常可以涵盖农业生产、家庭经营、外出务工、家庭照料和个人放松娱乐等不同选择(高小贤等,1991)。根据上述界定,本研究特别采取每项生计活动所花费的时间对生计策略进行测度,其中,对于农业生产、家庭经营、外出务工等生产经营性活动,主要采用一年中所花费的天数进行测量;而对于家庭照料、个人放松娱乐等非生产性活动,主要采用一天中所花费的小时数进行测量。

表1 变量的描述性信息

变 量	变量描述	频数(比例) /均值(SD.)	最小值/最 大值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22个题项的李克特5点量表,得分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	79.51(10.76) 39/103
	最近一次性生活时间	1=几天以前, 2=一周以前, 3=一个月以前, 4=半年以前, 5=一年以前, 6=几年以前	2.79(1.26) 1/6
婚姻关系	性高潮频度	1个题项的李克特5点量表, 1=从来没有, 2=很少, 3=有时, 4=经常, 5=每次	2.84(0.83) 1/5
	性生活满意度	1个题项的李克特5点量表, 1=非常不满意, 5=非常满意	3.47(0.66) 1/5
自变量	婚姻满意度	1个题项的李克特5点量表, 1=非常不满意, 5=非常满意	3.84(0.70) 1/5
	生计策略	从事农业生产时间	连续变量, 一年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天数 120.53(72.05) 0/360
控制变量		从事家庭经营时间	连续变量, 一年中从事家庭非农经营的天数 49.88(102.57) 0/360
		外出务工时间	连续变量, 一年中外出务工的天数 47.88(93.93) 0/360
		家庭照料时间	连续变量, 一天中照顾家人、做家务的小时数 4.59(2.47) 0/15
		个人放松娱乐时间	连续变量, 一天中放松娱乐的小时数 2.66(1.45) 1/12
		留守状况	1=非留守妇女 219(24.6%) 1
			2=准留守妇女 380(41.6%) 2
			3=留守妇女 301(33.8%) 3
		年龄	1=35岁以下 241(26.9%) 1
			2=35-45岁 451(50.3%) 2
			3=45岁以上 204(22.8%) 3
	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 446(49.4%) 1	
		2=初中 397(44.0%) 2	
		3=高中及以上 60(6.6%) 3	
	经济状况	0=名下无存款 602(66.6%) 0	
		1=名下有存款 302(33.4%) 1	

除此之外, 本研究还包括了年龄、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作为控制变量。其中, 考虑到农村妇女的个人收入与家庭收入难以分开, 因此采用“名下有无存款”作为农村妇女经济状况的测量。

(三) 分析策略

根据图1中的分析框架, 本研究的分析策略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其一是描述性分析, 主要采用方差分析和交叉表分析方法对比非留守妇女、准留守妇女及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生计策略、婚姻关系及相关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状况。

其二是因果关系分析, 针对非留守、准留守和留守妇女三类样本, 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 分别采用了三个模型, 第一个模型(对应模型1、模型4和模型7)以婚姻关系为自变量; 第二个模型(对应模型2、模型5和模型8)是在第一个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生计策略作为自变量, 第三个模型(对应模型3、模型6和模型9)是在第二个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年龄、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三、结果

(一) 描述性分析结果

表 2 中给出了三类妇女的比较分析结果。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较为年轻, 45 岁以上的比率分别为 21.5%和 16.9%, 而非留守妇女较为年长, 45 岁以上的比率达到 35.8%; 留守妇女的教育程度略低, 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留守妇女比率达到 53%, 而这一比率在准留守和非留守妇女当中分别为 45.4%和 50.7%; 留守妇女的经济状况介于准留守和非留守妇女之间, 名下有存款的留守妇女比率达到 33.2%, 而这一比率在准留守和非留守妇女当中分别为 36.8%和 26.7%。三类妇女在主观幸福感、性生活满意度、性高潮频度、婚姻满意度、从事农业生产时间、家庭照料时间、个人放松娱乐时间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 而在性生活时间间隔、从事家庭经营时间、外出务工时

表 2 非留守妇女、准留守妇女与留守妇女的比较分析

变量分类		非留守妇女 (219) 百分比(%)	准留守妇女 (370) 百分比(%)	留守妇女 (301) 百分比(%)
年龄***	35 岁以下	17.4%	31.3%	27.9%
	35-45 岁	46.8%	51.8%	50.7%
	45 岁以上	35.8%	16.9%	21.5%
	X ² 检验	X ² =32.43, df=4, p=0.000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50.7%	45.4%	53.0%
	初中	42.5%	44.9%	44.0%
	高中及以上	6.8%	9.7%	3.0%
	X ² 检验	X ² =13.36, df=4, p=0.01		
经济状况*	名下无存款	73.1%	63.2%	66.8%
	名下有存款	26.9%	36.8%	33.2%
	X ² 检验	X ² =5.98, df=2, p=0.05		
变量分类		非留守妇女 Mean/SD.	准留守妇女 Mean/SD.	留守妇女 Mean/SD.
主观幸福感		79.35/10.79	79.22/11.33	80.01/10.00
F 检验		F=0.92, p=0.40		
性生活满意度		3.44/0.68	3.50/0.65	3.46/0.66
F 检验		F=0.78, p=0.46		
性高潮频度		2.80/0.80	2.90/0.84	2.78/0.83
F 检验		F=1.74, p=0.18		
性生活时间间隔		2.13/1.12	2.63/1.15	3.44/1.18
F 检验***		F=58.94, p=0.000		
婚姻满意度		3.77/0.77	3.87/0.67	3.85/0.66
F 检验		F=1.38, p=0.25		
从事农业生产时间		125.41/75.37	117.44/71.05	118.66/68.33
F 检验		F=0.92, p=0.40		
从事家庭经营时间		55.14/108.56	55.03/107.50	37.51/88.03
F 检验+		F=2.98+, p=0.052		
外出务工时间		36.47/83.22	47.43/92.55	56.22/103.08
F 检验+		F=2.79+, p=0.062		
家庭照料时间		4.38/2.42	4.68/2.48	4.61/2.49
F 检验		F=1.07, p=0.35		
个人放松娱乐时间		2.61/1.35	2.66/1.52	2.70/1.46
F 检验		F=0.24, p=0.78		

间、年龄、教育程度及经济状况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留守妇女的性生活时间间隔最长，其均值介于“3=一个月以前”和“4=半年以前”；准留守妇女性生活时间间隔次之，非留守妇女的性生活时间间隔最短，均介于“2=一周以前”和“3=一个月以前”；留守妇女一年之中从事家庭经营的时间最短，均值为37.51天；非留守妇女最长，为55.14天，准留守妇女次之，为55.03天；留守妇女一年之中外出务工的时间最长，均值为56.22天；准留守妇女次之，为47.43天；非留守妇女最短，为36.47天。

(二)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表3给出了非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中，婚姻关系的4个变量中，仅有性高潮频度和婚姻满意度对非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地正向影响。模型2中，当加入生计策略的6个变量之后，原先婚姻关系4个变量中，婚姻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向不变，但系数和显著性均有所增加，但其他三个变量的影响方向、大小及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新加入的变量中，仅有家庭照料时间对非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型3中，当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原先婚姻关系的4个变量及生计策略的5个变量对于非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向、大小及显著性均无明显变化。而新加入的控制变量对于非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均无显著影响。

表4给出了准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模型4中，婚姻关系的4个变量中，性生活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对准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模型5当中，当加入生计策略的6个变量之后，原先婚姻关系的4个变量中，婚姻满意度变量对于准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向不变，但影响大小和显著性均有所减弱；其他三个变量的影响方向、大小及

表3 非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因变量：主观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自变量	婚姻关系	性生活时间间隔	-0.09	-0.11	-0.09	
		性高潮频度	0.29**	0.26**	0.26**	
		性生活满意度	-0.08	-0.07	-0.09	
		婚姻满意度	0.26**	0.30***	0.30**	
	生计策略	从事农业生产时间		-0.04	-0.03	
		从事家庭经营时间		-0.09	-0.09	
		外出务工时间		0.03	0.03	
		家庭照料时间		-0.17*	-0.17*	
		个人放松娱乐时间		0.06	0.05	
		控制变量：	年龄（基准：35岁以下）35-45岁			-0.12
	45岁以上			-0.13		
	教育程度（基准：小学及以下）初中			-0.05		
	高中及以上			-0.04		
	经济状况（基准：自己名下无存款）自己名下有存款			0.05		
			df	143	143	142
			Adjusted R ²	0.17	0.18	0.15
			F	8.24***	4.37***	2.84**

表 4 准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自变量	婚姻关系	性生活时间间隔	0.04	0.03	0.04
		性高潮频度	-0.06	-0.07	-0.05
		性生活满意度	0.15*	0.14*	0.12+
		婚姻满意度	0.18**	0.14*	0.14*
	生计策略	从事农业生产时间		-0.01	-0.03
		从事家庭经营时间		-0.11+	-0.11+
		外出务工时间		-0.09	-0.08
		家庭照料时间		-0.16*	-0.17**
		个人放松娱乐时间		0.12+	0.08
控制变量	年龄（基准：35 岁以下）	35-45 岁			-0.19*
		45 岁以上			-0.05
	教育程度（基准：小学及以下）	初中			-0.18**
		高中及以上			-0.19**
	经济状况（基准：自己名下无存款）	自己名下有存款			0.04
		Df	233	233	231
		Adjusted R ²	0.05	0.08	0.11
		F	3.74**	3.23**	3.12***

显著性均无明显变化；新加入的生计策略变量中，从事家庭经营时间及家庭照料时间均对于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个人放松娱乐时间对于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 6 当中，当控制变量纳入之后，原婚姻关系变量中，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大小及显著性均有所降低，其他三个变量的影响方向、大小及显著性均无明显变化；而原生计策略变量中，家庭照料时间的影响大小及显著性均有所增强，个人放松娱乐时间的影响从显著变为不显著，其他 3 个变量的影响大小、方向及显著性均无明显变化；新加入的控制变量中，年龄和教育程度均对于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

表 5 给出了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7 中，婚姻关系的 4 个变量中，性高潮频度、婚姻满意度对于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 8 中，当纳入生计策略变量之后，原婚姻关系变量中，性高潮频度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性消失，其他三个变量的影响方向、大小及显著性均无明显变化；新加入的生计策略变量中，仅家庭照料时间对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型 9 中，当进一步纳入控制变量之后，原婚姻关系各变量的影响方向、大小及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而原生计策略各变量中，家庭照料时间的影响方向不变，大小及显著性均有所减弱。新加入的控制变量中，年龄对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状况对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讨论和结论

描述性分析揭示，三类妇女的年龄和社会经济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与非留守妇女相比，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更为年轻，教育程度较低，但经济自主权更大。

表5 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自变量	婚姻关系	性生活时间间隔	-0.11	-0.10	-0.05
		性高潮频度	0.14+	0.11	0.10
		性生活满意度	0.07	0.08	0.06
		婚姻满意度	0.24**	0.23**	0.24**
	生计策略	从事农业生产时间		0.09	0.09
		从事家庭经营时间		-0.002	-0.05
		外出务工时间		0.03	-0.004
		家庭照料时间		-0.18**	-0.15*
		个人放松娱乐时间		0.02	-0.003
控制变量	年龄（基准：35岁以下）	35-45岁			-0.21**
		45岁以上			-0.21**
	教育程度（基准：小学及以下）	初中			-0.06
		高中及以上			-0.02
	经济状况（基准：自己名下无存款）	自己名下有存款			0.18**
		Df	204	204	201
		Adjusted R ²	0.12	0.13	0.17
		F	7.60***	4.42***	4.00***

准留守妇女和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与非留守妇女相比无统计学差异，并不支持已有研究中认为“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较低”这一论断（周庆行等，2007；叶敬忠等，2009）；同时，与之相对应的，三类妇女在性高潮频度、性生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方面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与已有研究发现不一致（周庆行等，2007；郭海健等，2013），也与本文的推断相冲突。可能的原因是：主观幸福感、性高潮、性生活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等更多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感受，其形成原因复杂多样。留守策略是出自家庭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吴惠芳，2011），可能并不必然导致留守妇女在性、婚姻及生活方面的负面感受。

留守妇女在性生活时间间隔上要显著长于准留守和非留守妇女，这与一般认知是相符的。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均短于非留守妇女，但这一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留守妇女从事家庭经营的时间短于准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而其外出务工的时间却长于准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可能的原因是，留守妇女利用外出探望丈夫的时间也找一份短期工作，因而缩短了她在家从事家庭经营的时间。

针对非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性高潮频度、婚姻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当生计策略变量加入时，性高潮频度的影响变小，而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变大。与此同时，生计策略中家庭照料时间对非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非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同时受到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的影响，但生计策略对于婚姻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当非留守妇女花费过多精力和时间照料家庭时，会使得她的性高潮频度和婚姻满意度都受到一定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水平。上述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因控制变量的加入而发生变化。由此可以推断，对于非留守妇女而

言, “爱情”和“面包”同样重要,而“面包”某种程度上是“爱情”的现实基础。

针对准留守妇女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婚姻关系变量当中的性生活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对准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生计策略变量加入时,性生活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的影响都有所降低,同时生计策略变量当中从事家庭经营时间和家庭照料时间对于准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对于准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影响,且生计策略对于婚姻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当准留守妇女不得不分心于家庭经营和家庭照料时,其性生活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可能有所降低,同时主观幸福感也有所降低。由此可以推断,对于准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也同样重要,“面包”某种程度上也是“爱情”的现实基础。但是与非留守妇女相比,准留守妇女追求“爱情”和“面包”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由于丈夫短暂离家(不超过6个月),在婚姻关系方面,准留守妇女更追求性生活的整体感受,而非性高潮频度;在生计策略方面,准留守妇女要同时承受家庭经营和家庭照料的双重压力。控制变量当中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对于准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35-45岁的准留守妇女比35岁以下的准留守妇女具有更低的主观幸福感,而教育程度在初中、高中及以上的准留守妇女比初中以下的准留守妇女具有更低的主观幸福感。可能的原因是,35-45岁的妇女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状况,家庭压力大,从而导致其主观幸福感降低;这也与已有研究观点相一致,即主观幸福感与年龄的关系符合“U”型曲线,在30-50岁之间达到最低值;而教育程度高的准留守妇女,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预期也越高,从而导致其对现实更为不满,主观幸福感也越低,这与已有研究一致(Clark & Oswald, 1996)。

针对留守妇女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婚姻关系各变量中,仅婚姻满意度对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性高潮频度对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也有正向影响,但仅在 $p < 0.1$ 的水平上显著,且当生计策略变量加入后,该影响就消失了。生计策略各变量中,仅家庭照料时间对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非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不同的是,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对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本是相互独立的。这说明,对于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同等重要,且“爱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因“面包”而发生变化。同时,留守妇女追求“爱情”和“面包”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由于丈夫长期离家,在婚姻关系方面,留守妇女更关注婚姻满意度,而对于性生活满意度、性高潮频度等有所忽略,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留守妇女在性生活方面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许传新, 2009; 吴惠芳等, 2010);在生计策略方面,给留守妇女造成压力的主要是家庭照料,这与非留守妇女相同,与准留守妇女不同。可能的原因是,留守妇女的丈夫外出务工增加了家庭的经济收入,使得留守妇女不需要通过家庭经营来增加家庭收入和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毛桂芸, 2010; 吴惠芳, 2011);准留守妇女因丈夫的收入和务工地点均处于不稳定状态,从而不得不承担家庭经营的压力;非留守妇女因丈夫可以更多地从事家庭经营活动,从而减轻了压力。控制变量中,年龄对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年龄较长的留守妇女比较为年轻的留守妇女具有更低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这与准留守妇女当中的结果相似;而自己名下是否有存款对于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较高的经济自主权能够有效提升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这与已有研究发现一致(罗楚亮, 2006)。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的结论是:对于留守妇女、准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都是实现主观幸福感的前提条件,但三类人群追求“爱情”和“面包”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在性生活相对匮乏的前提下,留守妇女更注重婚姻满意度,同时独立支撑家庭照料的重担是留守妇女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实现;对于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同等重要;准留守妇女更加重视性生活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家庭经营和家庭照料的双重压力一方面阻碍其主观幸福感的实现,另一方面也通过性生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而进一步影响到她们的主观幸福感;非留守妇女更加重视性高潮频度和婚姻满意度,尽管丈夫在家,她们同样也面临着家庭照料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实现,另一方面也通过性高潮频度和婚姻满意度而进一步影响到她们的主观幸福感。对非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都很重要,但同时“面包”也是“爱情”的现实基础。

[参 考 文 献]

- [1] 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省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http://www.ahnw.gov.cn/2006nwks/html/201105/%7B1A21D112-FAB3-4F78-9639-4306A458576B%7D.shtml>, [2011-05-17/2014-03-18]
- [2] 巢湖市统计局:巢湖市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http://www.chtj.gov.cn/A/?C-1-82.Html>, [2011-06-30/2014-03-18]
- [1] 陈浩.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发展 [J].人口研究, 1996 (4).
- [4] 陈雪娥.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研究 [D].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 2007.
- [5] 段塔丽.性别视角下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抉择及其对女性生存与发展的影响——基于陕南 S 村的调查 [J].人文杂志, 2010 (1).
- [6] 高小贤, 崔志伟.陕西关中地区百户农妇状况调查.中国妇女分层研究 [M].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 [7] 郭海健, 张正红, 徐静, 李小宁, 李靖.苏北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调查 [J].江苏预防医学, 2013 (3).
- [8] 罗楚亮.教育.收入与主观幸福感 [J].理工高教研究, 2006 (1).
- [9] 毛桂芸.农村留守妇女社会适应问题研究 [D].甘肃:西北师范大学, 2010.
- [10] 王嘉顺.农村留守妇女婚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基于广东五市的数据分析 [J].南方人口, 2008 (4).
- [11] 吴惠芳, 饶静.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综述 [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2).
- [12] 吴惠芳, 叶敬忠.丈夫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分析 [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1).
- [13] 吴惠芳.留守妇女现象与农村社会性别关系的变迁 [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3).
- [14] 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研究 [D].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3.
- [15] 熊承清, 许远理.生活满意度量表中文版在民众中使用的信度和效度 [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 (8).
- [16] 许传新.西部农村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及其影响因素——来自四川农村的报告 [J].南方人口, 2009 (2).
- [17] 叶敬忠, 吴惠芳.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b.
- [18] 叶敬忠, 吴惠芳.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婚姻关系的影响 [J].中州学刊, 2009 (3).
- [19] 中国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http://www.gov.cn/gzdt/2011-04/28/content_1854048.htm [2011-04-28/2012-07-05]
- [20] 周庆行, 曾智, 聂增梅.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来自重庆市的调查 [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7 (1).
- [21] 朱桂琴:“农村留守女性”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思考”, 天中学刊, 2006, 21 (4).
- [22] Andrews, F.M. & Withey, S.B. (1976). 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America's perception of life quality, New York:

Plenum Press.

- [23] Blanchflower, D. and A. Oswald. "Is well-being U-shaped over the life cycl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8: 1733-1749.
- [24] Clark, A.; Oswald, A. (1996).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1 (3), 359-381.
- [25] DeNeve, KM. (1999). "Happy as an Extraverted Clam?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8 (5) : 141-144.
- [26]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M].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 [27] Diener, E., & Biswas-Diener, R. (2002). "Will money increase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7 (2), 119-169.
- [28] Diener, E., Gohm, C. L., Suh, E., & Oishi, S. (2000). "Similarit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rital statu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cross cultur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1 (4), 419-436.
- [29] Diener, Ed (2000).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1) : 34-43. doi:10.1037/0003-066X.55.1.34
- [30] Diener, Ed; Suh, E.M.; Lucas, R.E. & Smith, H.L (1999).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 (2) : 276-302.
- [31] Fazio AF. (1977). "A concurrent validation study of the NCHS 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Hyattsville, MD: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Vital & Health Statistics, Series 2, No. 73, DHEW Publication No. [HRA] 78-1347*.
- [32] Heintzman, P., & Mammell, R. C. (2003). "Spiritual functions of leisure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Coping with time pressure", *Leisure Sciences*, 25 (2-3), 207-230.
- [33] Ito, Y., Sagara, J. U. N. K. O., & Ikeda, M. (2004). "Marital relationship, occupational lif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arried people". *Shinrigaku kenkyu: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75 (5), 435-441.
- [34] Jacka, T. "Migration, housholding and the wellbeing of left-behind women in rural Ningxia", *China Journal*, 2012, 67.
- [35] Jonas BS, Franks P, Ingram DD. "Are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risk factors for hypertension?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I Epidemiological Follow-up Study," *Arch Fam Med* 1997; 6: 43-49.
- [36] McDowell I, Newell C. (1987). *Measuring Health: A Guide to Rating Scales and Questionnaires*. New York: Oxford Press
- [37] Mu, R, van de Walle, D. "Left behind to farm? Women's labor re-allocation in rural China". *Labour Economics*, 2011, 18.
- [38] Neugarten, N. L., Havighurst, R. J., & Tobin, S. S. (1961). "The measurement of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6, 134-143.
- [39] Steel, P.; Schmidt, J. & Shultz, J. (2008). "Ref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 (1) : 138-161.
- [40] Taylor, J. E., Poston II, W. C., Haddock, C. K., Blackburn, G. L., Heber, D., Heymsfield, S. B., & Foreyt, J. P. (2003). "Psych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GWB) with African-American women",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12 (1), 31-39.
- [41] Wilson, W. R. (1967). "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67 (4), 294.
- [42] 罗丞. 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性生活质量的调节作用 [J]. *南方人口*. 2014 (6).

(下转第 24 页)

The Effect of Couples' Income Gap and Age Gap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Couples: Analysis based on Microdata

LU Wan-jun¹, ZHANG Bin-bin²

1.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00095; 2.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trate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28

Abstract :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2013, examines the effect of the couples' income gap and age gap on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The high proportion of wife's income in the family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husband if the total family income is controlled. The increase of husband's income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his own subjective well-being, while wife's income increase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her husband'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relative status of income within the family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wife and husband's income growth can significantly raise wife's well-being, while her own income increase is positive to her well-being. On the other hand, age gap of the couple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husband but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wife's subjective well-being. Further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wife's relative income increase on husband's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caused by his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concept, the more acceptance of the idea that husband's decision-makings should be the issues outside the family and wife's should be the issues inside the family, the more negative effect on husband's well-being. The above findings are robust in the test of OLS and ordered probit model.

Key words : Subjective well-being, Relative income status, Age gap, Concept of family roles, Resource exchange



(上接第 47 页)

A Study of the Impacts of Marital Relation, Livelihood Strategies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Women Left behind Hometown in the Rural Area

LUO Cheng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Shanxi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Xi'an 710065

Abstract : Based on the data from a survey of the rural women in Chao-hu, An-hui province, this study describe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arital relation and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the women left behind hometown and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marital relation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on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e comparison with other women. It found that the marital relation and the livelihoods strategies both affect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all women in the rural areas, bu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groups of rural women, the women the emphasis and specific contents in "love" and "bread" the women are chasing varies across the three groups. For the women left-behind separating from their husband long time, marital relation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are both important for them, that is to say love and bread are equally important for them shaping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independently. For other women, though love and bread are both important to them, they put more attention on livelihood strategy, which mean that bread is the basis of love in their practical consideration.

Key words : Rural Left-behind Women, Subjective Wellbeing, Marital Relationship, Livelihood Strategies